

Till Morning Comes

本书以美国正直的女
记者斯蒂法妮同中国进步
医生靳雅悲欢离合的恋爱
故事为主线，展现了中国
从抗日战争到“文化大革
命”的风云变幻，透视出
中美关系的云谲波诡。热
情歌颂了爱情和友谊。随
着中美关系大门的打开，
这一对异国情侣的爱情也
迎来了真正的黎明。

韩素音著 刘国明译 ★ 河南人民出版社

待到黎明到 来时 下



待到黎明到来时

(下)

待到黎明到来时

(上、下册)

韩素音 著

刘国明 译

责任编辑 夏晓远

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河南省卫生厅青年印刷厂印刷

河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787×1092毫米 32开本23.125印张 496千字

1990年4月第1版 1990年4月第1次印刷

印数1—7,200册

ISBN 7-215-00631-X / G·82

定价9.00元

十五

8月6日，联合国军在朝鲜的撤退结束了。大量的增援部队和美国杀伤力巨大的轰炸机结合在一起——连续不断的沉重打击几乎摧毁了北朝鲜所有的城市和农村——狂轰滥炸进行了十个星期才暂时停止。

麦克阿瑟采取了海陆空联合作战的令人钦佩的军事行动——海军陆战队从仁川市登陆，从三八线西端向东推进，把北朝鲜军队切成了两半儿——使战局发生了新的变化。战争的潮头改变了。在接下来的半个月中，北朝鲜的军队被迫撤出了南朝鲜。9月27日，麦克阿瑟胜利地进入了汉城。

一小群在上海的美国人，围着莱昂内尔·沙金那功率很大的收音机，听到了这条新闻。

联合国匆匆地通过一项决议，允许麦克阿瑟通过三八线进入北朝鲜。“这愚蠢的家伙跳进了火坑，”沙金说：“该死，该死……”

斯蒂法妮听到了从东京麦克阿瑟司令部发出来的阿利斯泰尔·乔特那很有修养的声音，那声音洪亮而清晰：“这几乎可以说是次愉快的推进。我们的军队士气高昂。在朝鲜的海军陆战队都是瓜达尔卡纳尔岛和冲绳岛的老兵，是经过两栖作战训练的军队……北朝鲜的军队正在被消灭……胜利已

经在望了。”

一切抵抗都被冲垮了。美国军队和他们的盟军正在以惊人的速度向北朝鲜推进。在联合国的主持下，南北朝鲜正在组织新的谈判。从东京麦克阿瑟的司令部还发出了好战的浮夸得令人恐惧的评论。

“这人的声音只着重征战，”莱昂内尔满脸愁容地评论说。

中国对这显然已对中国形成威胁的行动有了反应；麦克阿瑟主动去台湾拜访了蒋介石，他们谈了未来的联合军事行动，他们认为这是“最后胜利”的联合行动。

蒋介石宣称：“我们的目的是光复大陆。”

每天早晨，雍和斯蒂法妮都要听地方电台的广播。“中国人民不能麻木不仁地看着自己的邻邦遭受侵略，”电台这样说。

印度总理尼赫鲁，向美国政府发出了警告。如果麦克阿瑟的军队越过了进入北朝鲜的限定距离，中国将出面干涉……

但麦克阿瑟几乎是公开地宣称，他的目的是要“摧毁北朝鲜的避难所”，不管它在什么地方。杜鲁门总统担心麦克阿瑟无缘无故地去攻击在西伯利亚海参崴附近的苏联空军基地，10月11日飞往威克岛会见了麦克阿瑟。

鸭绿江是北朝鲜和中国的边界线。那里有中国供应东北工业用电的水力发电站。如果美国军队靠得太近，中国会感到受到了威胁。国防部和杜鲁门都否认任何“扩大战争状态”的意向，但被麦克阿瑟扶起来的南朝鲜总统李承晚却说：“战争不能停在鸭绿江边。”麦克阿瑟不顾一切限制条件，把军队一直向鸭绿江边推进……

斯蒂法妮，莱昂内尔·沙金，亨利·巴伯给美国政府，给他们认识的在美国的朋友写信，发电报。巴伯的新闻周刊解释了中国的观点。斯蒂法妮给她的爸爸写信，给她以前的编辑、出版者写信，给她的朋友们写信……

这些信发出后，没有一封回信。后来她才明白，它们都被没收了。她愤怒地对他们写道：“中国不想和美国打仗，”她写道，“除了浮夸的语言之外，中国的意见就是坐下来和华盛顿谈判……最不可能的事情就是他们需要或者想要战争……”

她还写了中国人对留在中国的美国人的态度。“当然那是‘不友好的’。但没有民族偏见。他们让美国人感到孤独；但如果战争继续下去，这也会改变的。”

美国军队继续向前推进。

“有制空权就有胜利，”阿利斯泰尔自信的声音说：“我们的轰炸机可以摧毁一切防线，摧毁朝鲜的城市、公路和铁路……平壤连一块石头都没留下。”斯蒂法妮听着他赞誉造成死亡的武器感到厌恶。

受到意外死伤的人不是战士，而是市民、群众，因为每一个村庄都会成为敌人集中火力轰击的目标。成千上万的人死于轰炸和继之而来的饥荒。道路上到处是成群结队举步维艰的难民，他们走着走着就死在了路上。

“有些军队是黑人……他们来自新几内亚，军营使他们感到有趣……在战斗的间歇，在平静的时候他们就奏乐……奏漂亮的布鲁斯舞曲……”阿利斯泰尔说。爵士音乐响起，斯蒂法妮的眼中流出了泪水。

麦克阿瑟从东京发出声明说，不许北朝鲜过鸭绿江去寻求“庇护的特权”，那意思指的就是中国。

收音机里又响起了阿利斯泰尔拖腔拉调、精确无误的声音：“非常明白，如果北朝鲜的军队得准爬回，进入避难所去舐他们的伤口，重整他们遭到重创的军队的话，接着而来的将会是另一次侵略……”

“哦，该死，该死，”莱昂内尔·沙金喃喃自语。

杜鲁门总统宣称：“我们从未考虑过要与中国敌对……”令人遗憾的是，这声明是在东京那好战的声音到来十天之后才发出的，它显得太晚了。

“甜言蜜语与威胁俱来，”北京电台轻轻地还击说：“他们正在向中国的前线推进，并且要越过它，而公开地又大谈柔软的话语。”

10月12日到20日之间，中国人民志愿军跨过了鸭绿江。鸭绿江已经结冰了，冰上有条大道。志愿军夜间过江后就消失到田野里了。他们戴着白兜帽，披着白披肩，这样在十一月开始的大雪中就看不见他们了。他们成单独的小队消失在北朝鲜的山脉之中，他们的数量很快达到了二十个师，二十万人。

中国人在十一月宣布说：“抗美援朝，保家卫国。”他们自称志愿军，这个名称最早是美国革命期间由拉斐特创立的。

中国医院为可能发生的全面战争作准备。

“我们不能只等着挨打，”雍说。他的常规工作已令他筋疲力竭了。他不仅仅要履行他在医院的职责，在非共产党组织的民盟中，他还是医院选出的代表。他每天晚上回来时都已精疲力尽，他一躺下就恍恍惚惚地睡着了，但还没睡够就又要起来去工作。斯蒂法妮想去，也需要去和他谈谈。

“瞧，你的国家和我的国家……我们到了彼此交战的边缘……”

雍只简明地回答了一句：“我们必须防止它……”他把她抱在怀中，紧紧地拥抱了一下，又走开了。

战争在扩展，越来越多的人正在卷入。

美国的预备队进入了朝鲜。联合国称之为“警察行动”，这是一种委婉的说法，今后的三年他们要“保护朝鲜”。

斯蒂法妮参加了护士工作，与吴大夫胆小的美国妻子吴琼在一起。

上海遭到了不辨善恶的炸弹的轰炸，她们参加了疏散儿童和孕妇的工作委员会。（一个谣言开始在美国的议员中流传，华盛顿正建议对北京和上海扔原子弹。）上海因为是建在浅滩上的，因此和建在岩石上的重庆一样，不能挖防空洞。群众必须疏散，这就意味着，他们需要进行完全正确的训练。教市民们空袭时该怎么办，到什么地方去。

妈妈的胳膊上带着“保健”袖标，告诉她那个区的每一个人第一个目标是什么。她和寡妇组织了一个担架队。

几乎每天都有对“抗美援朝”的表示。巡逻队在维持秩序、防止有人在轰炸中进行抢劫。

需要提高警惕的舆论在高涨。提高警惕，防止国民党的代理人、破坏分子和特务进行破坏活动。特务……任何外国人都没有特务嫌疑。

“这在任何国家都可能发生，”亨利·巴伯勇敢地说。他保持着沉着姿态。但他也瘦了。莱昂内尔·沙金，斯蒂法妮也一样，都瘦了。只有琼好象是没有受影响一样，她还是那

个样子，只是她经常用衬衫擦她的眼镜，好象眼镜老是脏的一样。

外国人开始离去，在人们印象中好象所有的西方人都反对中国一样。也难怪，在联合国的军队中，不是有十三个国家介入了朝鲜战争吗？

留在上海的这一小组美国人比任何时候都感到更需要做些什么事情，他们必须做些预防灾祸临头的东西。

在中国的每一个城市都有成千上万的人在欢送志愿军赴朝。在锣鼓声中，在红旗的海洋里，年轻人披红挂花地爬上军用卡车开进军营训练，为朝鲜……

在上海，企业家站在他们全体职员队列之前，为朝鲜捐赠他们的礼物——钱和布等东西。妇女慰劳队在为志愿军做棉衣棉裤，织手套和帽子。

人们从每一个家庭拿出了自己的捐赠，甚至从贫民窟中来的人也拿出了自己的捐赠物：一只银簪、玉簪，一对手镯，一个瓷盘，或者钱……

爸爸捐赠了字画，瓷器和他最后的一点儿金条。这一切都将被卖到海外，去换回战争所需要的钱。

妈妈把她的金银首饰全拿出来了，只留下了手镯。她不让斯蒂法妮把项链拿出来：“不，女儿，你一定要保存好它。有那么一天，你也要得到一个女儿的，冬宝要娶妻的，你将来给她……”

1950年11月23日，感恩节这天，联合国的军队在朝鲜用火鸡、咖啡、碎肉馅饼庆祝胜利。“军队要饮马鸭绿江，”东

京电台中一个幸福的声音说，“这是彻底的胜利……他们肯定能回家过圣诞节。”

11月24日，溃败开始了。

中国人民志愿军在麦克阿瑟的部队间打入了一个巨大的楔子。突然之间，所有的山头上都立起了人。三十个师向西方军队发起了进攻。他们一步步地前进，炸弹不能阻止他们的进攻。

又一次撤退开始了。收音机中那声音证明了这一点。吴大夫很吃惊，现在他和妻子琼也去听收音机。“我们中国人是从来不会承认象这样的屠杀，这样惨败的撤退的，”他说。

这第二次撤退好象还有些别的什么东西一样。亨利·巴伯困惑地说。“他们好象是在受到敌人的攻击之前就开始撤退了。”联合国的军队在撤退中混合在一起，他们在撤退中搞大破坏。到处都毁得成了荒无人烟的废墟，数以万计的居民无家可归，四处逃避，堵塞道路。撤退的部队为争道路而向逃难的人进攻。桥梁、铁路，他们只要一过去，美国飞机就把它给彻底炸毁。带着西伯利亚严寒的冬天落到了朝鲜的大地上。

中国现在充满了欢乐的气氛，同时，在东京的阿利斯泰尔·乔特的声音变得异常地幽暗，他忧郁地描述道：“残酷的人群从山顶倾泄下来，我们的残部束手无策。”

再次越过三八线。汉城再次落到了北朝鲜和中国人民志愿军的手中。

但1951年的新年，给美国军队又带来了新的转机。他们又打回来了，又打过了三八线。汉城又收回来了。双方军队都停下来了，停下来喘息。

战争暂时停息了。

他们回到了六个月之前他们出发的地方。双方都虎视眈眈地盯着对方，防护着自己的周围，几乎都在三八线上。

1950年圣诞节那天，冬宝两岁了。他得到一个玩具火车，一个玩具飞机，一个玩具兔子。但他最喜欢的是战争，他出去玩一圈儿回来之后就会高兴地叫喊，他在喊叫时乱蓬蓬的头发都在舞动。“打倒美帝国主义。抗美援朝，”他唱着，挥舞着穆奶妈给他买的玩具枪。斯蒂法妮不顾他狂怒地喊叫把它给拿走了，但她却回避不了那仇恨她的国家的语言，他喊起来那么有力，又那么天真无邪。

这孩子会玩轰炸游戏。他手中拿着玩具飞机绕着花园跑，喊着轰轰轰和叭叭叭，与此同时，比他大一点的一个堂兄燃放了一挂鞭炮，他们在玩战争游戏。在学校，孩子们都学会了，在轰炸时，一听到飞机响声就钻到课桌底下。蒋介石的飞机连续重复轰炸沿海城市，因此上海配备了高射炮。

“叭，叭，轰！”冬宝叫着。

斯蒂法妮记得吉米也喜欢玩战争游戏，戴着牛仔帽，拿着玩具枪对红印第安人射击。“你这坏蛋印第安……呼！”

雍能早点离开医院，在他的儿子上床睡觉之前回到家时，他就尽力去和孩子做些别的游戏。玩球儿。玩石弹戏。玩火车进站。玩任何能使他摆脱战争的游戏。

“杀，”冬宝喊叫着。“用我的火车去碾死他……”

“不，孩子，火车是让人去互相看望的。让我们坐火车去看奶奶。”斯蒂法妮也一起玩这游戏，从冬宝那儿买张火车票，坐上火车，她就唱起了“嘹哒那嘎，突突”的火车歌，这

歌总是把冬宝逗得笑了又笑。

他们想去形成一个幸福的小圈子，他们自己和他们的儿子，摆脱那正在进行的战争，去过正常的安静的生活。斯蒂法妮看到两个正在俯视玩具火车的头，那形状那么相象，都是一头浓厚的任性的黑发，她的心就象小羚羊一样突突乱跳起来。

深夜，强烈的爱情便在簇簇花灯中静静地不声不响地来临。在这小小的爱情的池塘中，所有的一切都停止了。斯蒂法妮和雍感情强烈地静静地依偎在一起，害怕爱得太深，害怕白天这爱会成为伤害彼此的武器……

有时候，斯蒂法妮在夜间会很轻地哭泣，她害怕会惊醒雍，他疲惫不堪地睡着。雍醒了，却仍装睡，一种疼痛忧伤之感在侵袭着他的躯体。“她的不幸完全是因为我的过错……我能分担她些什么呢？”

他们严肃地做爱，以此来消除彼此的悲伤和忧虑。此时悲伤消失了，衣服抛弃了。第二天早上，这悲伤会象衣服一样又裹在他们的身上，整整在身上粘一天，使他们从头到脚都感到不舒服。

“哦，天哪，”雍祈祷说，“让和平快来吧……”

“这场战争正在毁灭我们，”爸爸担心地说。“有一个裁撤军队的计划，军队是一个沉重的负担，超过了预算的百分之三十，但现在不能实行……”

“我们不能支持这场战争，”吴大夫说。

在空气中，一个胆怯的声音在升起。讲真话……

妈妈的眼睛下有个模糊不清的微弱的暗影。妈妈，总是

这么优雅，现在她出门穿着蓝棉袍，象个学生一样，还穿着平底浅口鞋。就这样，她的姿态在队伍中依然显得无比的优雅。她和寡妇一家一家地跑着为政府卖债券。

寡妇不再羞怯地惴惴不安地行走了。她现在直着身子，挺着胸脯，大大方方地走路。她有知识，有能力，有权威。街道上把她树为模范工作者进行表扬。她来找斯蒂法妮。

“你必须和我们一块儿游行，”她说，“去要求朝鲜和平。我们街道的所有家庭妇女今天都要参加游行……”

斯蒂法妮很不情愿地勉强答道：“我会为和平去走走的，但别要求我喊口号反对我的国家，那我做不到。”

寡妇看着她冷冷地说：“你有责任——你的儿子是中国人——你想让他长大当叛徒吗？”

寡妇每天都有心醉神迷的新发展，她觉得自己有用，需要。她过去的哀伤现在变成了不可思议的令人惊奇的优雅。她先前的悲哀考验了她，为她今天的荣誉作了准备，荣誉是她的，都是她的。没有别人的。她没有任何人。

妈妈什么都有。一个丈夫，一个儿子。一个漂亮的家。可寡妇只有革命给她带来的幸福，她充满了革命的激情。她，而不是妈妈，成了一位领导，她将行使领导权。她长期压抑着的对妈妈的敌意在增长。

“她曾以我的悲伤为乐，现在我要让她那高傲自豪的头向我低下……”

起初，寡妇自己也没有意识到她的这种感觉：它只是在她的心中增长，一点一点地天天增长。她向她的朋友们解释说（现在这条街上的每个妇女都想成为她的朋友），妈妈不

是一个缺德的邪恶的资本家，她仅仅是有点轻浮，喜欢享乐：她喜欢聚会，并常举行聚会：她的思想需要改造。现在寡妇象妈妈一样走路。但在会议上，一篇激励人的讲话之后，唤起了人们对她的尊敬，人们热烈地对她鼓掌、喝彩、称赞她（她那么喜欢讲话，紧跟着最新出版的报纸上的腔调，学着报纸上的言词），她对妈妈脸上那淡淡的笑感到厌烦。

“你讲得真好，六妹。”妈妈说。

斯蒂法妮的压力在增加，说不出来，但可以感觉得到。一种象瘴气一样的敌意。她显出一副木然的神态。

她在自我谅解。“我不能责怪他们。这是自然的。我是个美国人，美国人在杀中国人和朝鲜人……”

赫伯特·卢格以他常有的行为方式把这一切暗中隐藏着的東西带到了表面上。一天她下午下课后他在大学出现了。

“我想跟你说句话，斯蒂法妮。为了你的安全，我想你应该听听。”

“我要回家，赫伯特。我们可以一块儿走……或者在我家里见面。”

赫伯特精力充沛地摇摇头，说：“不，斯蒂法妮，我不再跨入你资本家的家门。”他抱着臂膀说。“告诉你你的行为是我们大家的一个可悲的典型，这是我的责任。我们是中国的客人。我们大家都在为和平而游行，为反对帝国主义那种凶暴的违反人性的犯罪行为而游行。”好象他的话还不够份量一样，赫伯特还带来了他那厚重的剪报夹子，让她看全世界的著名人物，科学家、律师、作家，都在抗议美国的战争行为。他把剪报夹放在桌子上，读中间的一些剪报。

斯蒂法妮打断了他。“赫伯特，我已经抗议了。我写过信。我曾说过我们进入北朝鲜是错误的……可我不能游行，高喊口号……”

“我们，”赫伯特带着兴趣抓住了这个代词，“我们……斯蒂法妮……你支持侵略者屠杀朝鲜人民吗？”

斯蒂法妮象爆炸了一样。“哦，混帐！我是个美国人，你也是！这一切使我的心疼，骨头疼，请你离开，让我自己呆着好吗？”

赫伯特摇摆着手指继续装腔作势地说着标语口号一般的话。斯蒂法妮想，连中国人都发现他怪诞可笑，她想起在延安时中国人送给他一个绰号叫蜈蚣。赫伯特·卢格尔总是在证明自己比任何人都革命。

“斯蒂法妮，你应客观地掂量掂量你的缺点错误。为什么连你的丈夫此时都因为你而在挨批评。”他看出了斯蒂法妮的怀疑和害怕，他继续愉快地说：“他没有告诉你吗？”

斯蒂法妮不再听他说下去了。他只会聒噪和污染。她跑出屋子，砰地一声关上了门。赫伯特在那儿，三三两两的人站在走廊上。听着。也许没有听。他们没有朝她移动。他们没有看她。她走向她的自行车，自行车在那儿立着。

车座上有一张纸，用胶水贴着，上边用中文潦草地书写着这样的话：

“帝国主义特务，滚出我们的大学。”

雍回到家时，她仍然坐在那儿，仍然裹着她那灰色的外衣，在半昏暗的卧室里，开着口的金属火盆里发出一些微

光。她没有回头。

他喊着她的名字走向她。她没有抬头看他，以有点可怜的姿态，举起了她手中的那张纸。他读了那潦草的字，小心地把它放在桌子上。毁掉它将会是一种危险的藐视群众意志的表示。

他把它放到了抽屉里。他坐下去把她抱在怀里。他们感到象灰烬一样，他们受到了灰烬的侵袭，自己也变成了灰烬。他们闪光的爱变成了灰，变成了灰烬。

“原谅我，”斯蒂法妮说。“原谅我，雍。”

“没有什么可原谅的，我的心肝。这都是我对你犯下的大错。”

“雍……你想……我们会……他们会让我们在一起吗？”

“是的，”他说，“是的……这会过去的……你会看到……这会过去的……”

那天夜里，他们感情强烈地无休无止地做爱，那使他们精疲力竭，但给他们留下的却还是不满意。这几乎是残酷无情的，他们仅仅靠彼此的身体去得到平静，消除疑虑。黎明又把他们带回灰烬之中，他们的爱又显出新灰烬的滋味。

雍将回医院去，今天已安排好一个公开批判他的会议。

“不仅仅是我，斯蒂法妮。我们所有的大夫，”他撒谎说。“因为我们中有些人感到志愿军入朝是不幸的。”

斯蒂法妮大为吃惊：“他们是谁？”

“我们中的有些人。但现在我们已知道我们国家不得不去干涉。可它对国家来说付出的代价太高了——”他微笑了，温柔而悲哀。“我们得忍耐它。它会使我们变得更为坚

韧不拔，更为顽强不屈。”他对她微笑。“别担心这个会议。它不会使我烦恼的。你知道，斯蒂法妮，中国是一个非常古老的国家。我们有巨大的耐性……”

雍没有告诉斯蒂法妮，他的三个最要好的朋友，吴大夫，席大夫和范大夫（他后来从重庆回来了，他现在已有七个孩子了），已经成了批评他的人。他们的妻子，吴琼是位美国人，米歇尔·伯比斯特是位比利时人，范太太是位中国人。范太太挺着她那生育力极强的肚子，三个女人一起参加了医院职工家属的游行队伍，高喊着口号反对朝鲜战争。他们私下庆幸，他们的儿子，在中国人的学校，因为他们父母的行动而受到了称赞。斯蒂法妮没有参加游行。

吴大夫对雍说：“你不要误解，老靳，我们对你批判将会是温和的……我们去批你会比别人去批你要好一些，他们会喊你特务或反革命的。”吴大夫和范大夫只在“主观主义”，“表现个人感情”、“中产阶级的无知”的范围内批判雍的行为。

他们也在关心别的人，那些低水平的人，会野蛮地插话谴责雍，反对雍的。“医院里的一位打扫厕所的清洁工说他象我一样对你极为注意，”席大夫说：“要记住，雍。”

“嗯，这是政治民主，”吴大夫叹了口气说：“人民统治嘛。”

“我感谢同志们对我的帮助，”雍以正常的自我批评的态度说。“我充分地明白了帮助我妻子更好地了解形势是我的责任。我没有这样做，那是我的错误，不是她的。”他引用了斯蒂法妮的信件，证明了她的重要性。他在保护斯蒂法妮，她可忍耐不了这样的单独挨批评。“我必须指出，我妻子是个作家。她是用写作来表示她的立场，游行不是她表示